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系属

合订本 第五十卷

希望过了〇〇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

贡献……
就的最记上要映现抓紧前各期戊戌年
不东先载发研新在紧‘’的方‘’戌献：：：
会西进下展究的当‘’开史面有以‘’
割‘’的来起‘’情然有国料记载下来……
断使都就来新况首些今值得得收集。时
历史人记消：：东但要研究现实问题，反
‘’知载失：：有些东西总是从旧东西也需
周道下。有些东西后基础，反
恩老来从最落后的赶快基础，反
来根予：：暴这露的旧到反

总第
146—
148 辑

文史資料選輯

卷首

合订本 第五十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目录

耆年忆旧

我的回忆片段/003

◎ 周士观

蒋军秘闻

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两次会议/015

◎ 陈远湘

蒋介石的一次军事部署/018

◎ 廖耀湘

1946年春蒋介石对东北的阴谋/020

◎ 范汉杰

1946年召开的徐州会议/023

◎ 韩 浚

《搜索要领》梗概/029

◎ 刘中权

经济史话

爱国实业家的楷模唐君远/033

◎ 唐翔千

回忆通易信托公司/041

◎ 李文杰

“蛋大王” 郑源兴/057

◎ 崔蔚人

边陲轶事

伊盟事变经过/078

◎ 陈长捷

预七师伊犁被歼回忆/090

◎ 蔡毓奇

文教史苑

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097

◎ 汪松年（木公）

回忆抗日战争前的山东乡村建设/114

◎ 陈亚三

日军强占燕大的前前后后/125

◎ 曹增群

师大复员返平团的回忆/129

◎ 徐英超

“开国纪念贫儿教养院” 忆述/133

◎ 全菊圃

关于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一些回忆/139

◎ 张企程

人物述林

先祖邵积诚公事略/143

◎ 邵循恕

何键其人其事/147

◎ 陆承裕

我所知道的廖耀湘/168

——当年在缅北痛歼日寇名震中外的历史人物

◎ 李以勤

补充·订正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177

◎ 梁漱溟

目 录

受降与接收

陆军总部及南京前进指挥所受降工作回忆/183

◎ 黄瀛

山东挺进军与济南受降纪略/193

◎ 李致中

入越受降回忆片断/198

◎ 万保邦

回忆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的经过片断/206

◎ 廖季威

我所经办的检察汉奸、战犯案/216

◎ 吴俊

我在军事委员会还都设营队的经历/222

◎ 丁绪曾

江苏接收片断实录/233

◎ 董赞尧

民国海军

我在东北海军的回忆/242

◎ 范杰

从护法舰队到渤海舰队/257

◎ 李毓藩

海军陆战队的见闻和我的一段经历/276

◎ 李世甲

我在海军陆战队的经历/284

◎ 刘刚德

海军大学风潮见闻/301

◎ 曾国晟

工商经济

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我的亲历/310

◎ 韩志明

在旧中国南、北交通部的见闻/314

◎ 张梓林

东北铁路十年回忆/322

◎ 卢景贵

湘桂撤退亲历记/338

◎ 孙锡华

目
录

军政史料

忆国民军训/349

◎ 李骧骐

国民党军需署亲历记/361

◎ 黄念勤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纪实/366

◎ 秦 箐

湖北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始末/374

◎ 李春初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380

◎ 章 培

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393

◎ 卢凤阁

国民党各派系在西南公路上的权利争夺/405

◎ 苏从周

人物述林

“山东王”韩复榘琐记/410

◎ 王华岑

我所了解的刘茂恩/420

◎刘亚仙

我所知道的刘郁芬/430

◎ 范学增

刘震东生平/443

◎ 刘 林 刘淑华

宗教史料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忆略/449

◎ 王佐良

解放前天主教在阆中概况/452

◎ 阆中县政协

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456

◎ 段德荣

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白全一亲历记/462

◎ 许英华

我所知道的虚云和尚/471

◎ 觉 澄

能海法师集传/482

◎ 仁 祥

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488

◎ 雪 嵩

杨仁山居士的生平及其事业/491

◎ 游于默 李 安

忆格达活佛/499

◎ 邓珠拉姆 来作中 于在滨 阿都泽呷

文化史料

艺涯南北七十年/504

◎ 徐志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 史 资 料 选 集

第一四六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回忆片段

◎ 周士观*

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求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传之后代，以供历史研究者之参考。

我时已经年逾60，但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写过什么。其原因一是怕写不好；二是有些事写出来，又怕有自炫之嫌。因而迟迟不愿动笔。

现在我已90有余，回忆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香港等处的一些活动以及在周总理和董老领导之下做的一些策反工作，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并且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记录下来，仍可以供后人了解一些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和动态。因就回忆所及，拉杂写成下列片段。

一 我在重庆时的一些政治活动

1937年以前，我担任甘肃省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总指挥马鸿逵的驻南京代表，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接触较多。1937年抗战以后，我又被甘肃省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参政会的组织除了各省推派的代表以外，各党派都有代表参加。也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也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参加。从此以后，我的活动面也就更加广泛了。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在丧失大片土地之后，不积极团结各种力量，励精图治，反而更加腐化，更加独裁。这就引起了后方广大人士的不满，并逐渐地形成一种中间的势力。

* 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后，任重庆弹子石机器厂管理处总经理、上海中国工矿银行总经理。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民建第三、四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是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逝世。



这个中间势力，包括着抗战以前早就存在的几个小的党派和一些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期望国民党能够放弃独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我本人也不例外。但我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成熟的主张。

我当时代表西北的实力派“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因此有些党派就想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以便在某些方面或可得到一些帮助。我自己也开始和各党派的负责人分别接触，以便决定我自己的道路。

我先和沈衡老接触。沈钧儒先生在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中，被党誉为左派的旗帜。他的爱国心的炽烈和态度的坚决，确非当时别的一些人所能企及。然而我以一个温和派的眼光，却把他的坚决看作是偏激。因而没有能够和他进一步接近。

接着我去访问民社党的张君劢。张君劢是我国有名的教授，也是著名的法学家。他的国际知识非常丰富，对国际情况也确实了解。但对国内问题则比较模糊。因此，在许多国内问题上他的意见我认为不正确，且常常为蒋介石的心腹张群和他的弟弟张公权所利用，拿他作招牌。我认为这是他本人的弱点，也是民社党的致命伤。所以当他派蒋匀田和他的妻弟陈某（是我的朋友）邀我参加民社党并允将来以国府委员畀我的时候，我就婉言谢绝，并劝他不要为张群和他的弟弟所利用。

在蒋介石悍然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劝他不要参加，并劝他向蒋介石建议取消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我认为那是只能增加纠纷而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当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在场）。张君劢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后来他还是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成了蒋政权的殉葬品。

同青年党的三个头脑——曾琦、李璜、左舜生，我都有接触。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派的组织，它建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成立之初提出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原未可厚非。但它建立以后，即专以反共为目的。曾琦讲，他们的党所以名为青年党，是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因此应以青年为基础；但他们的青年党却又一直和反动的官僚政客军阀相勾结，这就证明他们是些言行不一的政客。他们几个头脑给我的印象也不大好。曾琦类似一个老学究；李璜则性情暴躁，动辄就发脾气。一般来说，这是很难在政治上站住脚的。

左舜生给我的印象较好。他是大学教授，研究过历史，对国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们的党既以反共为目的，则最后必然要和蒋介石合流。果然，后来青年党终于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左舜生也干了几天短命的部长。他们的党也就从此以一个帮凶的身份消失于政治舞台。在他们将要参加伪国大的时候，曾要我参加青年党，并允给我两个立法委员的名额。我拒未应允。否则我也早和他们落个同一的下场了。

当时我接触最多的是农工党的章伯钧，并且在经济上帮助过他。

章伯钧有股闯劲。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敢闯。他原来跟邓演达组织了第三党。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之后，他倒能坚持立场，一直继续反蒋。但我感觉他很不稳妥。有一次他请我到他的重庆半山村寓所吃饭。他说要把第三党改为农工党，以农民、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为基础。我曾经劝他不要这样做。我说：“你这样搞，不是和共产党争群众吗？”可是他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到底还是改名为农工民主党了。

他曾极力劝我参加他所领导的农工党。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我的关系去拉拢西北的“四马”，作为他的实力后台。我也没有接受。我说：“我有我的工作。如果参加你们的组织，万一我的工作出了乱子就会影响到你们的组织的。”就这样，我也谢绝了。

在了解了各党派的情况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暂时采取超然的态度。所以在1939年11月间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李璜、黄炎培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时候，李璜起草章程，并拟推我担任“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执行委员，我便辞不接受。我虽没有接受“统一建国同志会”执行委员的名义，但该会的许多活动我都参加，而且该会的通讯处即设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操坝子巷30号我的办事处之内。

后来梁漱溟、黄炎培、李璜、章伯钧等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认为他们这些人都原有一个小的党派，他们参加政团自然名正言顺。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只是单个人，怎么能参加一个所谓“政团同盟”的组织呢？所以也没有参加。后来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他们聘我和施复亮、章乃器等为政治顾问。所以当时一般人认为我也是民盟盟员，事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报纸也登载过。

二 向党靠拢和参加军事策反工作

抗战以前，我对中国共产党很不了解。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也不清楚。1926年，我受山东省公署的派遣，到欧美几个国家考察军事工业。到欧洲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北伐战争。从国内得到的零碎消息，北伐战争真是轰轰烈烈。可是，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到底怎么样？共产主义在中国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在我的脑子中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回国的时候，特意绕道莫斯科，想对俄国革命进行一些了解。

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个星期，看了一些表面的情况。当时苏联虽然已经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生产仍很紊乱，饥饿现象还是非常严重。党内的派别斗争也十分残酷，给了我一些不好的印象。中国驻苏使馆人员给我作了些片面的介绍，更增加了我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怀疑。